



亚长墓出土的牛尊

□肖焕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晚春的河南安阳，弥望殷都区尽是广阔的原野。这里是中原，是母亲河流经的地区，这片土地滋养了多少人又埋葬了多少历史，我不甚清楚，但隐约感觉自己所处的偌大广场好像代表了一个海纳百川的文明，广场尽头但见一只巨大的青铜鼎矗立，门头上以甲骨文写成的“大邑商”三字，似乎娓娓道来它的来时路。

在这片土地下，车马青铜与甲骨卜辞曾静静沉睡了三千年，《尚书》《诗经·商颂》中所记载的商汤伐夏之史诗与盘庚迁都之秩序，本来注定尘封在文献之中。然而，1899年，药材“龙骨”上的奇异符文被发现，古老的文字遗迹让商代不仅仅存在于史书的事实初露端倪；1928年，在“龙骨”产出最多的河南安阳进行考古挖掘，自此，来自商代的战车重启辚辚之声，青铜焕发光彩，神秘而美丽的甲骨文大量出土，宫殿、王陵和祭祀坑遗址重见天日，让商代都城乃至商文明的存在终于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实。

2024年，形如青铜鼎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在安阳落成，从商晚期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多角度展开的“伟大的商文明”主题展览，让化而为商的玄鸟在今日羽翼更加丰满，迫不及待要讲述这个距今三千多年的璀璨文明的故事。

一代代考古学者的努力揭开了商晚期华丽都城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高度发达的国家形态、宗教制度和社会生活赋予了这座城市宫殿区、宗庙区和王陵区等多元的功能分区，亦让我们看到传奇女战士妇好的传记，其墓中发现的鸮尊等工艺精湛的青铜随葬品举世闻名。殷墟作为中国考古学上首次通过文献记载与实物发现相结合认证的都城遗址，其发掘与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或许，商代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只活在神话与历史课本里的朝代。对于其最知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许多人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或许就是殷墟博物馆成立并多次翻新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考古成果，更是为了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讲述与传承。作为一个专题博物馆，殷商的每一个重要特征，每一段重要历史和每一

个重要人物都被尽可能通俗又细致地描述。

“三千年前的声音，要经历多少风雨雷电，才能从沉埋中发出它的余响。”在商朝研究中，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字体系的甲骨文是当之无愧的重点，自然也是殷墟博物馆展览最大的主题之一。大多数人对于甲骨文的认知或许只停留在它是最早的文字和它用于占卜，却未曾知道甲骨文占卜的流程，亦未读过一段甲骨文上的文字。而殷墟博物馆告诉我们，当年商朝国王在祭祀、战争、狩猎等重要事务之前会用火灼烧龟甲兽骨，像神灵提出询问吉凶的问题，然后通过观察裂纹的形状、方向和大小来破解神灵的“回答”。最后，在甲骨上刻下占卜时间、占卜人、占卜内容和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此外，馆藏的每一片甲骨文展品下都将其内容用现代汉语抄录，当兽骨上古老而陌生的符号变为“癸卯卜，今日雨”的字样时，文物仿佛不再冰冷而遥不可及，眼前只有被火光点亮的宗庙祭坛，铜器庄严，祭牲低鸣……

走下三千年前的文字赋予我们的时光机，在展厅的末尾，我们看到熟悉的汉字以“象形字”“指示字”“形声字”等类别排列，展示其从古至今形象转变的整个过程。甲骨文的难以辨认及其内容的晦涩，时常让它被认为是由学者专属，但历代风雨的演变让它与当下生活联系了起来，当参观者发现“水”在甲骨文中形似弯曲形状的水流分支，不禁感叹汉字世界的浩瀚博大与沧桑，也凭空对被习以为常使用的汉字多了几分敬意。

殷墟博物馆的“长从何来”展厅，是介绍商代武丁时期高级贵族——亚长墓葬的展厅，他的名字不常在后世文献里见到，却也曾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他在社会地位上或许低于王后妇好，但他的青铜随葬品精美程度并不输妇好。对其遗骨的基因检测和甲骨文记载的“长国献龟”，亚长被认为是来自商朝边疆的异族首领，后被武丁收为雇佣军；亚长保留完好的尸骨上明显的创伤，经过检测和比对发现是由刀斧和戈矛等兵器造成，未曾愈合代表了他可能是在受到战争创伤不久后去世，是一位身先士卒的壮士；亚长墓中出土的栩栩如生的牛尊，以力大无穷的圣水牛为原型，做工创意不输妇好鸮尊，象征了亚长的骁勇善战。

亚长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随葬品：一只青铜制成的“手”。这只青铜手小巧却逼真，手臂上装饰有饕餮纹和眼形纹，体现了商代的自然崇拜和艺术想象力。许多参观者在玻璃罩前错位拍照，仿佛真的握住了这只来自3000年前的“手”。而关于这只手的用途，学界众说纷纭。一说是亚长的假肢，因为其时常带兵出征，可能因战争失去了右手，便铸造青铜假手作为义肢；一说为象征权力的权杖，将可以辨等列的青铜礼器塑造成手握大权的形状，置于亚长权杖的顶端；另有猜测其为笊篱、武器甚至是痒痒挠……虽然尚未有确切结果，但种种推测也让3000年前亚长可能的生活变得更加立体，除了知晓他作为将领的身份，今人也开始设想他那多彩的经历和沉浮的身世。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走出殷墟博物馆，再次踏上河南的黄土，商代——这一似乎因过于遥远而带有神话色彩的朝代的历史脉络与特征基本了然于胸。河流弯曲的意义是滋润更多的田地和人，而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则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时间不只是流逝，亦能成为可以回望和对话的存在。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



□刘中才

翻开明代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映入眼帘的是宫娥们褪去冬袄换上春衫的场景。这幅传世数百年的丹青瑰宝不仅用细腻的笔触描摹出茜色的纱衣，也让我们有缘窥见先民独特的穿搭智慧。

其实，古人的着装理念，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体现，只是囿于史料的散佚而难以作出具象的刻画。不过，夏商已经初见端倪。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可见经纬清晰、细密紧实的葛布纹样。这种被称为“緺绤”的面料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因此成为商代贵族阶级颇为喜爱的服饰。《诗经·周南》中留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的咏叹，由此道出春日采葛制衣的古老传统。

迨至周朝，葛布制成的春季常服尤为盛行。《周礼》载，西周王府专门设有掌葛之职，“以时征緺绤之材于山农”。周王朝都城发达的葛纺织技术一度远播至吴越一带，《越绝书》卷八说：“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的麻布残片，每平方厘米经纬密度达到600根，其精细程度堪比现代人穿的亚麻。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发现的“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用锁绣技法呈现春山云气，轻薄如纱，重量仅有49克，可谓皇家贵族春日穿搭的标配。

汉唐时期，随着养蚕技术和缫丝工艺的突破性发展，曲裾拂柳的汉唐风韵催生出独特的穿搭体系。长沙马王堆辛追夫人墓中，12件单衣构成的“非衣”葬服里，最外层的印花敷彩纱单袍仅重48克。这种采用凸版印花与手工描绘相结合的制作工艺，让素纱衣料绽放出栩栩如生的藤蔓纹样，印证了《盐铁论》里“罽衣金缕，燕貉代黄”的记载。

而唐代长安城里的春衫时尚更具国际视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绣半臂，效仿波斯工艺，用金箔捻线，绣出宝相花纹，并融入中原的写意风格，委实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暮春的街市上，仕女们将西域

传来的帔帛与本土独有的高腰襦裙混搭，形成一幅“虹裳霞帔步摇冠”的春日盛景，不仅彰显出年轻人的时尚审美，也成为众多男女青年踏青郊游、谈情说爱的必备服饰。

宋代的文人尤爱风雅，褙子便成为宋人穿搭的一枝独秀。宋朝的褙子作为男女通用的惯常服饰，上至皇家官吏，下至士人商贾，无不喜爱。宋代褙子的样式有直领对襟式、斜领交襟式、盘领交襟式，腰间用勒帛系束，下长过膝，是一种常礼服。南宋诗人黄昇墓出土的褐色罗印花褶裥裙，采用“交窬”剪裁法，用二十四幅裙片暗合节气之数，行走时如春水微皱，颇有风韵。李清照《浣溪沙》中“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的词句，更是与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的素纱大袖衫相映成趣，诠释出宋代文人别具一格的春装美学。

明代女子则在前朝历代穿搭基础上发明出另外一种“春服体系”。孔府旧藏的天青色素缎比甲，前襟缀有活动的银扣，可以结合气温变化自由穿脱。山东邹城明鲁王墓出土的织金马面裙，用“过肩蟒”纹样替代传统龙凤，下摆暗藏可以拆卸的膝襕，既保持了礼俗规格，又适应踏青需要。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将其称之为“应时之服”，形象地展现出古人高超的实用美学思想。

纵观历史，不难琢磨，在衣香鬓影里的生活哲学中，古人的春夏穿搭不仅融有审美意识，更蕴含深刻的天人观念。《齐民要术》记载的“春分染帛”习俗，实际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因为春天冰雪消融，河水初涨，矿物染料最易上色，染布是最佳时令。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雍正帝观花行乐图》中，帝王身着月白色实地纱袍，正是遵循“春服宜素”的礼制传统。

从马王堆的素纱禅衣到孔府的妆花蟒袍，古人用一根丝线串联起三千年的记忆。这些轻薄却不单薄的春衫，不仅承载着古代纺织工艺的巅峰成就，更凝结着“顺应四时”的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史专栏作家)